

21107

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盐亭县委员会编

PDG

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八 辑

目 录

文同遗著《丹渊集》·····	廖仲宣	(1)
千秋四绝话文同·····	廖仲宣	(3)
盐亭农业在探索中发展曲折中前进·····	王寿熙 杜崇高	(14)
建国四十年抗洪救灾纪实·····	冯秀冬	(26)
发展中的盐亭茧丝绸事业·····	李清锐	(39)
回族同胞在盐亭·····	何天度	(45)
盐亭县民经济发展概况·····	达鹏轩	(50)
富驿基督教的演变·····	王宗林	(58)
上古黄河是流入四川吗·····	王德奎	(63)
学史杂记二则·····	刘泰焰	(65)
解放前后盐亭的商会·····	袁德万	(70)
成都医生在盐亭·····	杨作清	(79)
盐亭民俗、民间文艺之时代观·····	杨明光 杜述吟	(82)
民国时期盐亭的民间文化·····	杨旭东	(86)

文同遗著《丹渊集》

廖仲宣

北宋中叶的文同（今四川省盐亭县人），一生勤奋好学，刻苦求知，坚持创作，从不竭笔。他是我国一位有名的苦学成才的典范。被誉为诗、楚辞、草书、绘画“四绝”的全才式的艺术大师。由于他在我国绘画史上首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不施勾勒，一笔写成的所谓“墨骨”之法，为写意墨竹之鼻祖，和“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所以，文同墨竹一出，时人仿效蜂起，很快便形成了一个流派，人称“文湖州竹派”。对于他这个诗人、辞赋家、书法家反为其画名所掩。故“人知爱湖州之画，而不知爱其文，非文有不工于其画也，人之所见之不至也。”他在世62年，著述甚丰，惜乎生前无集！到了他的曾孙文璣时，才将其家传存稿以其所居为别，编家集诗分为18卷。即：东谷古今诗3卷，南谿古今诗2卷，临邛、广汉古今诗各1卷，陵阳古今诗3卷，汉中古今诗2卷，梁洋古今诗3卷，西冈古今诗1卷，画厨乐府杂咏各1卷。到了南宋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家诚之知邛州，才将文璣编的家集诗、连同搜集到文同的杂著、记、序、表、启、先状、奏状、文、墓志等进行了汇编，名曰《丹渊集》。共40卷。另拾遗2卷，附录1卷。传至明朝，寥寥四百余年，尘积雨渍，加之虫蚀，庆元刻本，日益稀少。到了明神宗万历（公元1573—1620年）

时，《丹渊集》已为“世所罕见”。这时，陈仲醇、毛晋、李务滋、吴建先等有识之士，又重新进行了刊刻。就是现今流传下来的《丹渊集》“四部丛刊集部”、“上海涵芬楼藏明汲古阁刊本”。

家诚之编的《丹渊集》，一开始就是北宋的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知河阳府范百禄所撰的“文公墓志铭”。接着是“石室先生年谱”。再次是《丹渊集》目录。卷第一、词赋，共17首。这种富于抒情成份和浪漫气息的骚体辞赋，就是文同“四绝”之一的楚辞。这是家诚之有意“列于首篇目，见先生用意于古学。”从卷第二起至卷二十，是按地域分卷的诗作。即：卷第二、乐府杂咏34首。卷第三、四、五、旧集东谷诗159首。卷第六、七、旧集南谿诗80首。卷第八、旧集临邛诗51首。卷第九、旧集广汉诗35首。卷第十、十一、十二、旧集陵阳诗127首。卷第十三、十四、旧集汉中诗93首。卷第十五、十六、十七、旧集梁洋诗162首。卷第十八、旧集西冈诗56首。卷第十九、画厨杂咏21首。卷第二十、挽诗29首。另外，卷第四十、拾遗上、诗16首。以上共计诗863首。

从卷第二十一一起至卷第四十，以及拾遗下为文章。计有：卷第二十一、杂著10篇。卷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记24篇。卷第二十五、二十六、序15篇。卷第二十七、二十八、表22篇。卷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启80篇。卷第三十三、先状9篇。卷第三十四、奏状8篇。卷第三十五、文14篇。卷第三十六至四十，均为墓志，共24篇。另外卷第四十、拾遗下、杂著5篇。以上共计文章211篇。最后，附录诸公书翰诗文。

家诚之在编《丹渊集》时叹息地说：文同诗文“散落不

存者多矣！”尤其与苏轼的往还酬答和有关记载，即使“存者”，也由于“党祸炽烈”而常被删削、窜改。故他在《〈丹渊集〉拾遗卷跋》曰：“诗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盖当时党祸未解，故其家从而窜易。斯文厄至于此，可胜叹哉！”家诚之所谓“其家从而窜易”，盖指他在编《丹渊集》之前，文薮所编的那个辑本。

家诚之编辑的这部《丹渊集》，无疑是对继承我国传统文化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惜乎所编文同诗文只按地域分卷，不作系年，而又编得较乱，往往互串。这不能不对今人从事文同的学术研究时，感到是一件美中不足之事了。

千秋四绝话文同

廖仲宣

文同（公元1017—1079），字与可，号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文湖州。梓州永泰县新兴乡新兴里（今四川省盐亭县）人。他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诗画大师。

文同曾祖彦明、祖父廷蘊、父亲昌翰三代都“儒服不仕”，是一个以农为业的书香之家。祖先文翁，庐江人，为蜀郡太守，治绩卓著，子孙因家于蜀。传至西晋名贤文立，迁居巴之临江（今四川忠县），后人再迁梓州永泰。

文同自幼发愤攻书，有志于学，昼则尽力于家事，夕则

读书，常通宵达旦。十二岁时，去永泰县城卖柴，触犯官轿，受跟差笞责，遂立改革弊政之宏愿。未冠，已熟读经史，精通诸子百家。乡人甚异之，其父亦以“汝其起家乎？将高吾门于吾庐之东偏以待”相勉。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27岁的文同听文彦博守成都，礼贤下士，奖掖后进，遂带上诗文进献。文惊叹其才，以其所献示府学，博得了学子们的高度赞誉。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在梓州应举，得“乡书第一”。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登进士第五。次年到邛州（今四川邛崃县）任军事判官。在任上，他依法惩办了横行乡里、欺诈百姓的歹徒，劝导地方的子弟多多入学读书，并请当地有学识的长者担任教师，或回归故里教化民众。在此期间，曾先后兼摄蒲江、大邑两县政事。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自邛州还京师，调静难军（邠州新平郡）节度判官。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自邠州召试馆职还朝，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次年秋，被诏校《唐书》新本。与欧阳修、司马光、苏洵、宋祁、王安石等人过从甚密。特别是在参加校订《新唐书》工作中，在欧阳修、宋祁的直接指导下，在做学问上有很大进步。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以亲老数上表辞谢，要求调回故乡。再判邛州。次年父去世，丁父忧返永泰乡居。

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服丧期满还朝，又以母年老请通判汉州（今四川广汉）。遇苏轼于岐（即凤翔），遂订交。次年夏秋间摄守邛州。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六月迁尚书祠部员外郎，赐五品服知普州（今四川安岳）。次年冬母死，丁忧辞归永泰乡里。

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三月，服满还京，任职太

常礼院兼编修《太宗正司条贯》。与陈荐等议宗室袭封事，执据典礼，违上意旨，夺一官，由五品降为六品。再请乡郡，以太常博士知陵州（今四川仁寿）。在任上，他访民疾苦，得知城中有一群不逞之徒，常于夕时为非作歹，使当地居民暮即阖户，不敢夜行。文同即查出其为首歹徒，严加惩治，又告诫其胁从者勿复为乱。从那以后“虽篝火宵行，无复忧者”，百姓对此非常满意。陵州辖区贵平县有男子借道斂财，欺诈百姓。远近走集，争投财货，并准备大修庙宇。文同亲往其地，捕获首恶，黥而徙之，余不追究。将被骗财物，全部上交国库。破除了此猖獗一时之迷信活动。又派出役吏擒获西山匿盗。此后，郡民安居乐业，秩序井然。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春，文同改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东），到任后，延见当地父老，向他们保证：不扰民，不浪费，厉行节约，为政清廉。要他们督促自己子弟，努力从事耕读，不要争讼。不久，他发现兴元虽富裕，然民风重财轻文，愚昧落后。便积极倡导办学，自己常去督促检查。还请准朝廷兴办府学，委派教授。这一措施使当地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改变了陋习，学文成风。次年，神宗鉴于他忠勤王室，授予他尚书祠部员外郎。文同作《谢复官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秋，改知洋州（今陕西洋县），此时正值朝廷推行新政的“榷法”，茶叶和食盐均归官府专卖。洋州产茶，但交通闭塞，商旅不通，国家收购不尽，官盐又不能及时供应，民间茶叶堆积如山，百姓苦于“淡食”。文同为此向朝廷奏请暂缓实行榷法，改以茶叶换取外来食盐，并开禁准许茶商收购，既避免山民荷担远行送茶叶和堆积损耗之害，又使百姓无缺盐之苦。神宗准其奏，“輿诵欢然”。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冬，文同离开洋州，到达京师。判登

闻鼓院任职。与苏辙议其季子务光与辙之长女婚姻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神宗召见延问，文同建言二事：一曰，洋州与秦凤接壤，地域辽阔，凶盗常常抢劫，境上人不得安宁。官军一去藏匿幽谷，官军一走，又出来作乱。请置官吏于五丈原，或骆谷与华阳镇相援，以御绝其害。二曰，百姓远道州府投诉，官司久拖不决，如一旦判决又有不服者，走数千里，集积在京师的登闻鼓院门下，状子越积越多，官司没完没了，百姓为诉讼事竟至废弃农桑。今后凡州府官吏拖延诉讼或草率判案造成冤案者，要严加处理。吏知恤取，就公正办案。这样冤案就少，冤民就不再集聚京师了。神宗同意这些很好的政见。冬十月，文同乞请去东南地区，获准。次年春奉命出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途中因病卒于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宾馆。享年六十二足岁。

文同一生宦途奔走三十余年，所到之处百姓称为“廉吏”、“清贫太守”。然而他留给我们的不仅在于政德，而在于文艺。他是我国历史上拥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大师之一。苏轼称他在文艺上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在“四绝”中，以诗为首。其诗在艺术成就上，突出有两点：一是以描写景物见长；一是以图画入诗见称。他的写景诗寄情野谷丘林，清新素雅，玲珑秀美，风格朴素，不讲究修饰词藻，生活气息十分浓郁，占他创作的诗歌四分之一以上。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说：“文同在诗中描绘天然风景，常跟绘画联结起来，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象这样以画入诗的手法，的确是开创了新的蹊径而被肯定下来，成为此后写景诗的一种常用方式，而这样的方式，“西洋要到18世纪才有类似的例子。”文同的创举竟比他们早七百年，在诗史上树立了特殊功绩。不能不说他

是我国诗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评论家对他的诗誉之为“精绝”（《冷斋夜话》）。时人文彦博、司马光、三苏父子等对他的诗作交口称誉。司马光在给文同的信中称赞他：“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评文同诗说：“置之开元（唐玄宗年号）诸公（指盛唐诗人，包括李白、杜甫在内）集中，殆不可辨。今日‘宋无诗，岂其然乎！’并认为五律有韦应物、孟浩然之风。”钱允治也说：

“文湖州高文健笔，与苏氏并驰；诗律清新，兴高寄远，大多出入杜陵；文体绚烂，句琢字炼，不无踪迹昌黎。”由于他的诗风格清新，语言平易，不事雕饰，为宋诗中有值得师法的“超然独诣者”，故历代选家多选其诗入集。

他的诗作，更多的是乡村田园情景。耕男桑女，牧童樵夫被描绘得特别淳朴可亲，花鸟虫鱼，桑柘蒲荷，又把他的诗作点缀得分外艳丽。如五言古诗《村居》：

日影满松窗，云开雨初止。

晴林梨枣熟，晓巷儿童喜。

牛羊深涧下，凫雁寒塘里。

田父酒新成，瓶罍饷邻里。

在一个疏月当空，高松落影，大地如画的秋夜，他独自徘徊于林下，为这美丽的月景所陶醉而久久不能入睡。眼前看着那池塘里因惧怕秋风而卷缩的荷叶和久雨后而坠落的山果，他触景生情，尽心苦吟，在这静谧的故乡除了林间蟋蟀鸣叫外，再也没有什么伴着诗人吟咏了。在他的笔下，展现出这月夜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画面，倾吐出文同热爱乡土风物的赤子之情。——《新晴山月》：

高松漏疏月，落影如画地。

徘徊爱其下，及久不能寐。

怯风池荷卷，病雨山果坠。

谁伴予苦吟，满林啼络纬。

作为画家的文同，不仅诗中有画，而且是以画入诗。他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周围景物，集于笔端，摄为小影，吟成为富有诗情画意的好诗。如七言律诗——《早晴至报恩山寺》：

山石巉巉磴道微，拂松穿竹露沾衣。

烟开远水双鸥落，日照高林一雉飞。

大麦未收治圃晚，小蚕犹卧斫桑稀。

暮烟已合牛羊下，信马林间步月归。

看，这一首反映农村生活的诗篇，给我们描绘了多么富有生活情味的画面，色调是那样的鲜明阔朗，视点从远水高林移到村外麦地桑丛，当他归来时，又从村外移到村中，这种把诗情画意融为一体的艺术佳品，随着视点的移动，真把我们带到了他的故乡，神游了古代农村的四月那种以自然经济为特色的乡土风光。

再如五言律诗《凝云榭晚兴》：

晚策倚危榭，群峰天际横。

云阴下斜谷，雨势落襄城。

远渡孤烟起，前村夕照明。

遥怀寄新月，又见一梭生。

此诗写景妍秀，画面澹远，真不愧为画家之手笔。

苏轼曾经在致文同信中有过这样的话：“老兄诗笔，当今少俦，惟劣弟或可以仿佛。”又说：“又见兄之作，但欲焚笔砚耳，何敢自露。”故他把文同诗列为“四绝”之首是独具慧眼的。

文同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赵氏

王朝对外屈膝，对内镇压，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加到劳动人民头上，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引起了农民革命的不断爆发。到了宋神宗时，为了改变这一“积贫积弱”的严重局面，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相，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由于新法压抑了大地主、大商人以至皇族的利益，因此遭到保守派的坚决反对，党争之祸日趋剧热。文同因厌恶官场的恶习，吏治的腐败，力图避开激烈的新旧党争，持“独远之”的态度，故长期在穷困山区任地方官吏，致未遭党争之害。又因他出身贫苦农家，青少年时亲历农事，深切体验百姓“其性朴质”，“颇善耕稼”，而自己却无力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拿了百姓血汗的“俸禄”，深感问心有愧，故自嘲为“窃禄”。他在《自咏》诗中说：

看画亭中默坐，吟诗岸上微行，

人谓偷闲太守，自呼窃禄先生。

可是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他是十分同情的，故在不少诗作中对统治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倾吐出劳动人民血泪的心声。他的《织妇怨》就是一首具有人民性的千古名篇。文同在这首诗里，对当时作为贡品、长期以来驰名中外的故乡的鹅溪绢制作过程中，织妇们的艰辛劳动和监官的横加挑剔，用白描手法，如实描写。穷困的织妇为了完清一家沉重的租赋，她哪里还顾惜自己的衣裳。宁可把自己的肩膀和膝盖裸露在外，以忍受严寒的侵袭。“当须了租赋，岂暇恤襦裤。前知寒切骨，甘心肩胛露”。当累得“掷梭两手倦，踏茧双足茧。三日不住织”终于织成一疋“皆言边幅好，自爱经纬密”的好绢送交官府时，监收官竟故意刁难，百般挑剔，恶狠狠地在这美好的绢匹上，打上了退货的图印，“大

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弄得织妇“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日夜不停地重新赶织。但还未织好，里胥地保们又登门紧逼，叫骂不休，怪罪交织太晚。这种难堪的局面如何了结？文同在诗的最后发出“安得织妇心、变作监官眼”的呼喊！这是多么沉痛，多么深刻！他用诗歌呐喊出织妇们心底的不平；他用诗歌控诉那些作为皇家的鹰犬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和迫害；用诗歌对统治者发出愤怒的斥责！这样的名篇，足可以和杜甫的“三吏”、“三别”，孟郊的《织妇词》，聂夷中的《伤田家》相媲美的。

另一首《宿东山村舍》写的是作者与一老农的对话。诗一开始就写道：“八十雪眉翁，灯前屡歔歔，问之尔何者，不语惟擦泪。”接着叙述老农种粟，遭受虫灾，减产歉收的严重情况，在这饥荒年中哀叹“供家固未足，王税何由备”的焦虑愁苦心情，转而哭诉“在世幸许年，必以饥寒死”的撕心语言，使文同“闻之不敢诘，但愧有禄位。”当晚“移灯面空壁，到晓曾不寐。”文同这样的诗篇又何逊于唐代李绅等人的悯农诗呢？

文同不仅有量多质高的诗，同时还有不少富于抒情成份和浪漫气息的楚辞。这种骚体辞赋在他的笔下写得典雅铺张，情采动人。春有草树，山有烟霞，皆是造化自然。然文同则择自然界中的美好事物，用以表现他洁身自好的情趣和清高思想。他的《莲赋》和《松赋》，便是以绘物寄精神，以铺排藏议论。《莲赋》写得采淡而丽，“挺浊淤以自洁兮，澡清漪而逾丽”，“笑华花之上品兮。”与同时人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中之“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花之君子者也”不无异曲同工之妙。《松赋》写得苍劲有力，“度众木而特起兮，有高松之可巍。擢

双干以旁达兮，耸千寻而上击”，树之挺拔高大，枝之繁茂郁苍，直指苍穹，伟岸傲立。“停余雪而暖溜兮，栖宿雨而晴滴。险穴聚乎魑魅兮，阴枿藏乎霹雳。蒙烟雾之涵润兮，傲冰霜之惨威。”他把松树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用浪漫主义手法加以描写，达到了形神兼备，活灵活现的境地。结尾处写道：“敢并名于杞梓兮，甘取消于樗栎。”杞和梓，是两种美好的木材，比喻优秀的人才，樗和栎是两种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文同把杞梓与松树并名，而把无用之材的樗栎加以取消，以抒发他满腔热情地赞扬松树顶天立地的高尚品格。

在《送人》赋中，他把那种凄怆孤零的别恨离情更是写得情景交融，发人遐想。“风寥寥兮黄叶飞，黯冥冥兮寒满衣，历欹嵌兮山逕微，背晨霞兮送子归”……

文同并不满足于他在诗、楚辞以及记、序、表、启、状、墓志等文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在书法、绘画上则更加刻苦，万难不屈。正如苏轼所说的“与可诗文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的确他在书法上也是名重当时的大家，与苏（东坡）、黄（山谷）、米（南宫）、蔡（君谟）齐名。他深有感触地说：“余学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顾素之为各有所悟，然后至于如此耳。”可见他是何等刻苦，潜心钻研，中法心源，外师造化，不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充分展现出自己的独创精神。致使他的书法结构严谨，意境高古，以险峻逼人的体势表现出神气横溢的独特面貌。尤其是他的草书兼有钟繇的古朴和二王的秀美，顾张狂素的风骨。故尔作书时能“落笔如风，初不经意，坐人争索。”苏轼在《与可飞白赞》中说：“与可岂其多好，好奇也歟，抑

其不试故艺也？始予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篆、隶也，以为止矣。既没一年，而复得见其飞白，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翩翩乎其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蒂也；离离乎其远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惜乎，其墨迹今尚存者仅有王献之《献梨帖》和范仲淹《道服赞》的题跋。

画坛上，文同更是负有盛名的大画家。善画山水，花鸟、人物，尤擅画墨竹。他在庭院的四周广为栽竹，常常深入竹林，细致观察，悉心苦钻，反复研究，体察竹之四季变化，掌握竹之生长规律，从竹的生根、发笋、拔竿、长叶都留心记载，摹画写生。正如他给苏轼说的：“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朝与竹乎为朋，暮与竹乎为游，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荫，观竹之变也多矣”。爱竹之情深竟至达到了“宁可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的地步。由于他长期作画，大胆创新，运用书写之法画竹，把书与画的笔墨技巧融为一体，不需古人那种勾勒之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终于创造出了画竹叶“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不施勾勒，一笔写成的所谓“莫骨”之法，成为了写意墨竹之鼻祖。他画的墨竹各具姿态，曲尽生意。或“疑风可动”如“飞龙舞凤”，或“欲向人而笑”“游人见之，心自清凉”。不仅具有明暗透视之功，而且产生枝伸叶立，如出绢纸的良好效果。这在九百多年前的宋代，特别是我国写生画对于光线的运用如此之早，文同的这一创举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自此，文同墨竹一出，名声大噪！向他求画的人络绎不

绝，接踵而来。他都热情接待，大书大画，任意挥洒，一气呵成，皆成佳作。传说他画在墙上的竹子，麻雀信以为真，纷纷飞投过去，碰壁而落，观者无不惊叹！苏轼赞曰：“穷猿投壁，惊雀入牖”。黄庭坚赞曰：“疑风可动，不笋而成”。苏洵生前曾求文同墨竹诗曰：“淡君笔端有新意，倏忽万状成一挥”。许多趋炎附势的官吏豪绅为了装饰门庭而附庸风雅，捧上绢帛，登门向他求画。文同鄙弃他们的为人而嗤之以鼻，把他们的绢帛抛置地上，并且骂道：“吾当以为沫！”这充分表现出他的清高自许，乐道安贫，宁愿把自己的作品送给善良的人，而不屑送给这些豪绅官吏。但对当时朝中有的官员如张潜等“迁疏修道”他却主动赠送象征“屈而不挠”的《筼筻图》，鼓励张潜等象筼筻竹一样，刚直俊秀，挺拔生长，自强不息。当苏轼得到筼筻图后，动心骇目，赞不绝口。连想到自己遭受的种种打击和文同对他多次的忠告，到了元祐八年，还特地请了玉册官祁永将筼筻图刻石立碑，又亲笔写了《跋与可筼筻》文章赞誉。号召人们学习筼筻竹这种屈而不挠的可贵风节。

这时，向他学画的人仿效蜂起，很快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文湖州竹派”。正因为他的墨竹和“胸有成竹”的绘画理论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其文名为其画名所掩。自宋开始“人知爱湖州之画，而不知爱其文。就是这个原因。

文同在世时“以写竹名天下”，其文名被画名掩盖而无集。又因与苏轼关系密切，为避党祸，有关诗文多有散失或被篡改。今日所见之《丹渊集》，其中有诗863首，文章211篇，乃南宋家诚之搜集编撰。虽然远非全豹，但亦足见其著述之丰富，涉及之广泛。

“文湖州竹派”九百余年，代有传人。元朝的墨竹画家柯九思、李衍、吴镇等，专门搜集宋元两代学习文同画竹技法的画家25人的小传，编辑成名曰《文湖州竹派》。在这一派中，有文同的二女儿文氏，有文氏的儿子张昌嗣，还有文同的从表弟苏轼。到了明朝，水墨兰竹继承宋元传统，有所进展。特别著称一时的要算王绂、夏昶。清朝，著名的画竹高手有石涛、石溪，八大山人以及“扬州八怪”等。民国至今，文同的“胸有成竹”画竹理论和“浓墨为面，淡墨为背”的法则，仍然指导着画家们进行画竹的实践。因此，墨竹师文，世代相传，它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墨竹真迹今存世甚少。据考察共有四幅。二幅藏台湾省故宫博物馆，一幅存上海博物馆，另一幅则早已流至国外。

盐亭农业在探索中发展，曲折中前进

王寿熙 杜崇高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盐亭县农业生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通过辛勤的劳动，取得了解放前从未有过的巨大成绩，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但也有错误和失败。今天，认识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对进一步完善农

村经济，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是十分有益的。

(一)

盐亭地属丘陵，人民勤劳俭朴，自古以来，以农为业。解放前，由于受封建剥削的压迫和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摧残，生产力极其落后，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一九四九年，全县农业人口为三十六万三千人，农业总产值为四千八百三十四万元，人平一百三十三元，其中粮食总产为一亿五千三百万斤，亩产一百四十七斤，人平生产二十二斤，棉花为四千〇九十八担，亩产十二斤，人平生产一斤一两，油料为四万一千四百担，人平生产十一斤四两。劳动人民长期缺粮缺饭，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穷苦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实行互助合作，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推广良种，改革耕作制度，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从一九五六年起，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确立了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次序安排，农业是基础，强调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全县上下贯彻中央指示，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农业生产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到一九六六年，全县农业人口为四十五万四千人，农业总产值为九千五百一十一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九十六点七五，人平二百〇九元。其中粮食总产为二亿五千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三点一，亩产二百六十二斤，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二三，人平生产五百五十一斤，增长百分之三十点五七，棉花为五万四千四百担，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十二倍，亩产九十七斤，增长七倍，人平生产十二斤，增长